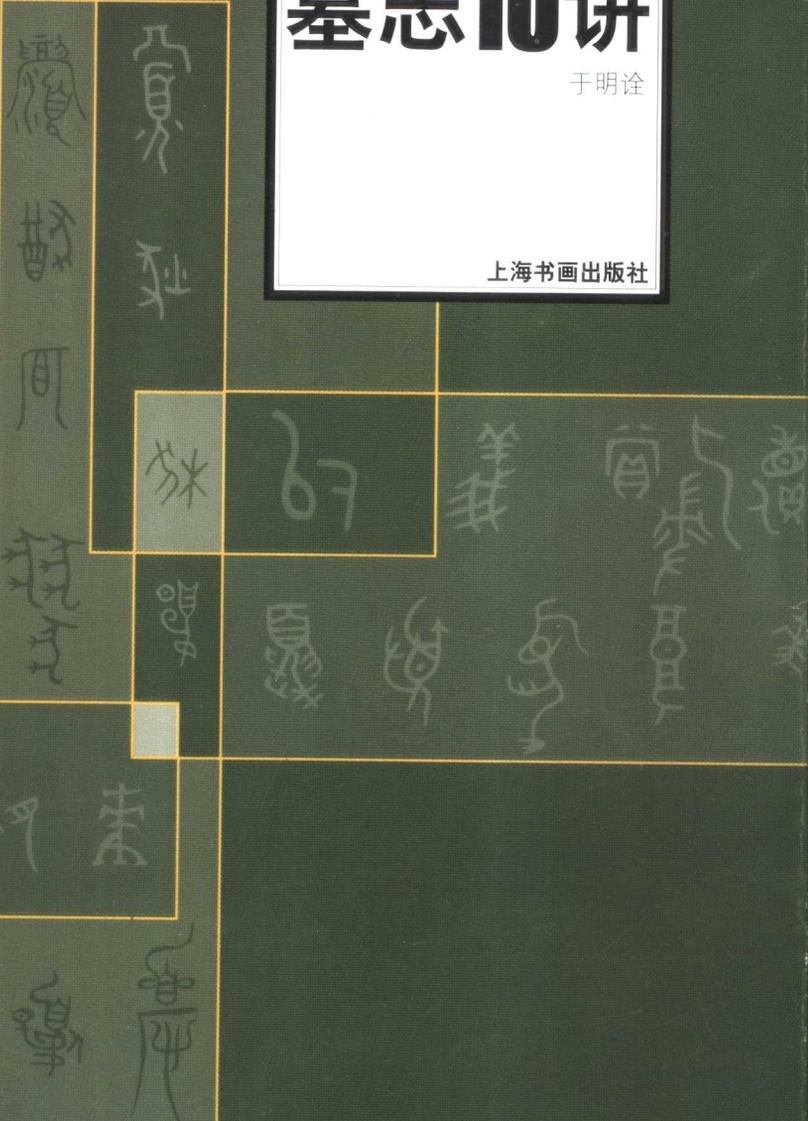


中国书法经典名家讲座丛书

墓志10讲

于明诠

上海书画出版社



中国书法名家讲座

墓志 10 讲

于明诠 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墓志10讲 / 于明诠著.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3.12

(中国书法名家讲座)

ISBN 7-80672-695-0

I. 墓... II. 于... III. 墓志-书法

IV. J29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03564号

责任编辑: 胡传海

封面设计: 范乐春

技术编辑: 朱伟南

中国书法名家讲座 **墓志 10 讲** 于明诠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 593 号

邮编: 200050

网址: www.duoyunxuan.com

E-mail: shcph@online.sh.cn

浙江临安康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9 × 1194 1/32

印张: 3.375 印数: 1-5,000 字数: 80 千字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72-695-0/J · 619

定价: 12 元



于明诠，别署于明泉、于是乎等，1963年生，山东乐陵人。中国书协会员，沧浪书社社员，山东书协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委员，山东青联委员，供职于山东政法学院，任哲学教研室副教授。

书法篆刻作品曾多次入选全国书法篆刻展览，并在第六、七、八届中国青展中荣获一等奖，获国家文化部第八届群星奖银奖，被中国文联授予“全国百名优秀青年艺术家”称号，应邀拍摄“全国著名书家50人临摹示范VCD”，出版《于明诠书法篆刻集》、《于明诠书诗册》、《常有梦斋初集》（书论随笔）、《当代著名青年书法十家精品集于明诠卷》等，发表论文多篇。

目 录

- 第1讲 埋铭葬志 —— 墓志源流与形制演变·····1
- 第2讲 视同碑策 —— 三国两晋南朝墓志与行草书风
的兴盛·····9
- 第3讲 千岩竞秀 —— 北魏墓志造像与魏碑书体····· 17
- 第4讲 大唐风度 —— 隋唐墓志与唐楷典则·····31
- 第5讲 风华旖旎 —— 墓志书法名品概览（上）····· 41
- 第6讲 铭心绝品 —— 墓志书法名品概览（下）····· 53
- 第7讲 墓志情结 —— 于右任与张钫····· 63
- 第8讲 书卷金石 —— 碑帖之争与墓志书法审美····· 69
- 第9讲 丝丝入扣 —— 墓志临习技法简析·····79
- 第10讲 去粗取精 —— 墓志书风的创作转换····· 89

第1讲 埋铭葬志

——墓志源流与形制演变

清代乾嘉时期，考据之风大兴，学者书家们竞相搜罗古代碑刻志石铜器甲金，大力研究金石之学。后来由于阮元、包世臣及康有为等人的大力提倡，在书法史上形成了一个势头强大的碑学运动，尊碑抑帖一时成为潮流。这种对先民碑刻志石的推崇与标举，无疑对元明以降日趋靡弱的帖学书风起到了振拔与反拨的作用。三百年来，书法艺术的发展波澜壮阔，流派纷呈，大家辈出，其原因固然很多，但阮、包及康氏碑学理论与实践的作用自然功不可没。在碑学大系统中，墓志则又是一个相对完整而又十分丰富的子系统。滥觞于两汉，成熟于北朝，大盛于隋唐的墓志书法，其数量之众多，风格之繁杂，书刻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其中一些墓志中的经典名品，已成为今天我们学习书法者必须临写的楷书范本，成为我们上窥隋唐及魏晋书风的不二法门。

墓志，也称“墓志铭”或“埋铭”、“圹铭”、“圹志”、“葬志”等，简单地说，就是记载和标识墓主身份及墓址的物件，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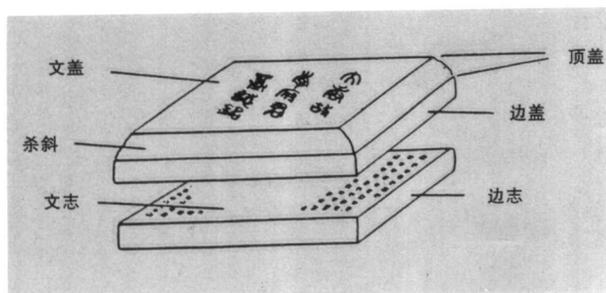


图1-1典型的墓志示意图

为墓主的附葬品，入葬时同主人棺槨一起埋于墓穴中。多数墓志为石

质，也有砖、坯、陶及瓷质，典型的墓志为石质方形，上面刻写墓主姓氏、世录、官职及生平事迹卒葬年月等，此为“志石”；另外，志石上面往往还覆盖一块斗方块石以保护志石文字不受损坏，此为“志盖”。志盖覆斗顶面则以篆书或隶书刻写墓主姓名、官职及时代。志盖上面的四个斜面也往往凿刻一些复杂的纹饰。如图1-1就是典型的墓志示意图。

1. 明旌·刑徒砖

关于墓志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清代学者叶昌炽认为墓志始于西汉，罗振玉、马衡等人认为墓志最早出现于东汉；而顾炎武、端方等认为墓志始于南朝。显然，清代学者的结论是根据前人记载及亲见墓志实物或墓志拓本时所得出的，这就必然受到当时墓志出土情况的限制。民国以后墓志大量出土，仅1949年后，全国范围内出土墓志就数以千计。特别是1979年秦刑徒砖瓦的出土，使人们对墓志又有了新的认识，有学者提出，这些随葬的刑徒砖瓦上面刻记着死者的姓名、籍贯、爵位及身份名称等，应视为我国发现最早的墓志。当然，若追本溯源，墓志最早应起源于周代的“明旌”。明旌是当时的丧具之一，用丝

帛织成，上面写记死者名姓及身份或画其像，出殡时作为信幡在棺前张举，入葬后则覆盖于棺槨之上一起埋于穴中。明旌或者说信幡作为丧具的习俗，至今在民间依然存在。严格说来，其与后来的墓志用意并不完全相同，因此，它只是后来设立墓志的缘起，但还不完全等同于后来的墓志。而认为秦代刑徒砖瓦是目前所发现最早的墓志则似乎更有道理，尽管它与后来墓志在形制、文字内容方面有所不同，但都是刻写墓主姓名、官职、身份及埋葬墓址并随墓主附葬的，作用意义是相同的。若从典型意义来看，1990年河南偃师出土的《姚孝经砖志》(73)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砖质墓志，而1929年洛阳出土的《马姜墓志》(106)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石质墓志。

2. 墓·坟·墓室刻文

作为对墓主的纪念或对墓址的标识，何以不矗立墓外而埋于墓内呢？这就是墓志与墓碑的区别了。我们通常将“坟”与“墓”并称，但两者是有区别的。墓指人去世后葬埋的墓穴，而坟则是指墓上隆起的土堆、土丘。按商周时代的丧葬习俗，即使王侯贵族死后也只是有墓而无坟。《易经》里说，上古墓葬，不封不树，即是此意。东汉崔寔《政论》说：“古者墓而不坟，文、武之兆与地齐平。”就是说周文王和周武王之墓也一样与平地齐整，这说明当时确实没有墓上起坟的制度习俗，当时用于标识墓主姓名身份及墓址的便是前面所述的“明旌”。营筑坟丘进行墓祭的礼俗最早见于春秋时代。《礼记·檀弓》曾记录孔子为父母起坟墓祭一段言论，孔子说：“吾同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

可见，孔子知道上古有“墓而不坟”的制度风俗，他之所以要为自己父母筑起高四尺的坟丘，是因为自己是东西南北四处奔波的人，以免对父母祭拜时找不准墓址。由孔子此语推测，此时开始有了墓祭风俗，因为在上古时期，后人对先人的祭拜仪式只能在宗祠举行。这种墓祭的典礼风俗始于春秋而盛行于汉，当时称“上冢”或“上墓”，其意与我们现代“上坟”、“扫墓”大致相近。

据史料载，春秋战国时期，棺椁入葬时，墓穴旁边往往设有一种类似今之轱辘的支架，用绳索借助此架徐徐将棺椁送入墓穴。这种支架或木质或石质，用毕随棺椁一起埋于墓穴。随着墓祭风俗的渐次盛行，后来这种支架一律采用石质，上面刻写墓主姓氏、官职及卒葬年月等，不再埋入墓穴之内而是立于坟前，这便是后来墓碑的雏形。最早的墓碑与石桩、石柱相类，如现存山东省博物馆的《庶孝禹碑》，凿刻于西汉河平三年即公元前26年，碑高1.45米，圭状，上刻“平邑侯里庶孝禹”，此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墓碑（如图1-2）。当时墓碑一般有圭首和圆首两类，圆首碑往往刻有三道晕，以象征墓碑用于引棺入圻的绳索之纹。也

图1-2《庶孝禹碑》



有的墓碑上端带有圆形穿孔，称为“碑穿”，就是当初棺槨下葬时拴系绳索所用。汉代墓祭之风盛行，特别到了东汉，王公贵族的茔域制度发展得十分完备，亡者均按辈份长幼依次排列墓位，墓上起筑高坟大冢，种植松柏，坟前筑神道，树立神道碑，修建神道阙，墓碑的雕凿也愈加精致，这一形制因此也固定下来。但墓碑形制的完善固定并没有取代墓穴内的标识，作为丝织物的墓内标识物件——“明旌”依然存在，其形制、质料、文字内容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悄悄地发生变化。至秦代，墓内除埋有“明旌”外，也出现了“砖志”和“瓦志”，上面或写或刻有关于死者姓名身份的简要文字，如前面所述秦代刑徒砖铭。至汉代，具有识墓作用的刻石文字多出现于墓门、主室墓柱、墓壁及画像石的边框处。如1987年河南唐河新店新莽时期画像石墓内刻文“郁平大尹冯君孺人始建国天凤五年十月十柒日癸巳葬，千岁不发”。文字内容虽简短，但与后来墓志文字已颇为相类。东汉时，许多墓内又出现了在石槨和黄肠石上所凿刻的铭文，如东汉郭仲理、郭季妃石槨分别刻有“故雁门阴馆丞西河圜阳郭仲理之槨”、“西河圜阳郭季妃之槨”，西晋冯恭石槨的题字为“晋故太康三年二月三日己酉赵国高邑导官令大中大夫冯恭字元恪”，另外还刻有冯恭诸子之名。这类题字已与当时许多单设的墓志几乎一样了。因此，随着丧葬制度与祭墓风俗的发展演化，一方面，墓外之墓碑形制趋于固定完善；另一方面，墓内之墓志不仅没有被墓碑所取代，也逐渐演化为另一种特殊的墓葬标识——墓志。墓碑与墓志仿佛一对孪生兄弟，同源却不同形，且墓志比之墓碑成熟较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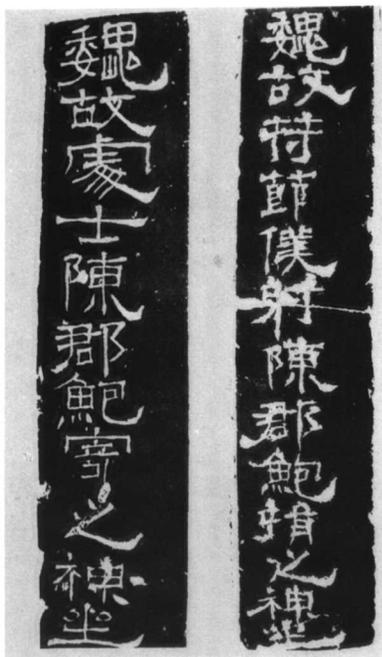


图 1-3 《鲍捐神座》、《鲍寄神座》

3. 枢铭·神座·墓志形制的渐趋统一

三国两晋时代出现了独立意义上的墓志——枢铭、神座，因此这一时期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墓志产生期或转型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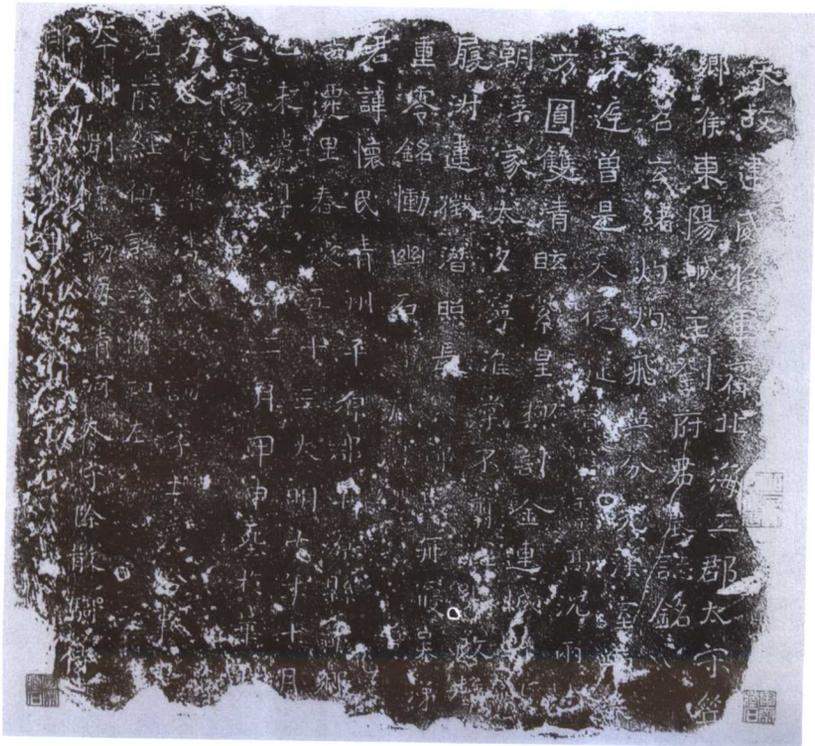
所谓枢铭、神座，其形状与墓碑相类似，石质，圭形或碑形，所刻写的文字内容或简或繁，规格一般较小，埋于墓内。如民国初期，河南洛阳同时出土的《鲍捐神座》和《鲍寄神座》（如图 1-3），神

座亦称神坐，为神主牌位，从文献记载可知晋代以前墓室中有设立神座的制度，以后则逐渐消失了。由于这些神座设在墓内，且刻记墓主姓名爵里等，故将其归入墓志类。出土的同期枢铭有《贾充妻郭槐枢铭》、《武威将军魏维枢铭》等，有的不称“神座”、“枢铭”，而称“碑”，如《徐夫人管洛碑》、《处土成晃碑》、《晋中书侍郎荀岳碑》等等，均为碑形石质，或圭首或圜首，直立于墓室内，铭文体例也与汉墓碑大略相同，故亦归墓志类。形同墓碑，而又何以不立于墓外却埋入墓室之内呢？这要从汉末禁碑之风谈起。

如前所述，汉代筑坟立碑之风大盛，尤其到了东汉，世家大族、达官显贵崇尚厚葬，争相筑坟立碑营造石阙，其堂皇豪

华之风愈演愈烈，不惜倾家荡产为先人营造豪华墓阙以显示家庭荣耀者亦不鲜见。《后汉书·崔寔传》载，崔寔为父大办丧事，不惜变卖田产耗尽家财，就是一个例证。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爆发，从此战乱频仍，加之厚葬奢靡之风盛行，使得民不聊生，经济凋敝，富有政治远见的封建地主阶级政治家曹操于建安十年（205）为恢复经济，杜绝浮华奢靡之厚葬风，下令不得厚葬，并禁止立碑。此后魏文帝曹丕也下“薄葬诏”，高贵乡公曹髦也一再重申禁碑之令。此后五六十年间，碑禁甚严，一些士族豪强达官贵人都不敢立碑，只得把墓碑做得很小，埋在墓室之内，这

图1-4《刘怀民墓志》



些袖珍式墓碑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墓志。

早期墓志一般为碑形，石质，规格较小，且下端有跌座，是立于墓穴之中的，志文大略与同时期的墓碑碑文相同。至两晋南北朝时，墓志这一形式广为流传，石质考究，书刻精致，其规格渐渐增大且固定为方形或准方形，下端去掉跌座平铺埋置于棺前或棺侧，后又在志石之上加放志盖以保护志石文字，志盖以篆书书之。如《西晋左棻墓志》，制于西晋永康元年（300），石质，书体均为隶书。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志，制于东晋永和四年（348），石质，表面涂漆，高28.5厘米，广37.3厘米，书体为楷隶。南朝宋大明八年（464）的《刘怀民墓志》（如图1-4）更为典型，石质，高49厘米，广52.5厘米，书体为楷体正书。至如北魏元氏墓志无论石质、书刻则更为精美，其字体劲拔豪迈，与著名的碑学经典《龙门二十品》气息极为相似，其形制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墓志的标准样式了。

因此，墓志这一碑刻形式，就其出土实物来说，最早可上溯先秦，滥觞于两汉，而盛行于两晋南北朝及隋唐。然而从书法艺术角度来看，在墓志产生、发展的过程中，它不仅使我们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汉字书体的演进过程和书法艺术的风格嬗变，并且使我们在风流蕴藉、儒雅淳美的帖派书法脉系之外，看到了另一道亮丽景色，这就是奇崛、豪宕、古朴、厚重的碑体书风。

关于三国两晋南北朝及隋唐墓志的不同风格及其与书法艺术变化发展的关系，下面分别介绍。

第2讲 视同碑策

—— 三国两晋南朝墓志与行草书风的兴盛

1. 曹魏、西晋禁碑与墓志俗尚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三国演义》的故事在我国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英雄疆场拼杀，生灵遭受涂炭，曹魏政权虽然统一了北方，但经济凋敝、人丁稀少，成为新兴政权稳定和巩固的首要难题，因此政府下令禁碑反对厚葬是十分明智的。但东汉士大夫以名节相尚，多年形成的好名习尚使他们总是热衷于刻石纪功、树碑颂德之类事，就连曹操本人虽力主禁碑，一生节俭，但谈到自己的志向时，也说过“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曰：‘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的话。但当时客观情况如此，三国时期墓志的出土绝少，目前仅有鲍捐、鲍寄神座等出土，且形制、刊刻极为简单草率。三国时期大书法家钟繇（151—230）虽然其铭石之书最为称好，却无碑石字迹传世。

司马氏于公元265年建立西晋政权，作为儒家豪族，司马氏崇尚名教，注重门阀，大力提倡孝道，因此，社会上层统治阶

级的生活方式再次出现奢侈糜烂势头，且愈演愈烈。在丧葬礼制方面，虽然仍沿袭曹魏以来碑禁之制，但皇室宗亲“居亲丧皆逾制”。由皇室延及贵族豪门，厚葬之风再度兴起。晋武帝咸宁四年(278)不得不再次颁布诏令禁碑。这期间一些豪门贵族只得将墓碑做成较小型号，埋于地下墓室之内。虽是埋于地下，但碑石雕琢讲究，书刻亦相对工整精致。如297年的《处士成晃碑》，高69.3厘米，宽28.8厘米，圆首，



图2-1 西晋《处士成晃碑》

上刻三道晕痕，晕之两侧又刻螭首纹饰（如图2-1）。这类碑石因埋于地下，虽称碑而实为墓志。类似情形，西晋还有《徐夫人官洛碑》、《沛国相张朗碑》、《晋中书侍郎荀岳碑》以及《贾充妻郭槐柩铭》、《武威将军魏维柩铭》等，皆形似墓碑，或圆首，或圭首，其实为墓志。直称墓志的有《裴祗墓志》、《左棻墓志》、《天水赵氏墓志》、《华芳墓志》、《菅氏夫人墓志》等。西晋墓志形制均呈矩形碑状，至今所见者约计二十余块，出土地点集中于故都洛阳、偃师一带。

三国西晋时期，因袭汉代风尚，崇尚文化。虽战乱频仍，文学尤其诗歌艺术、书法艺术皆不乏名家名篇，其中曹氏父子的文学造诣就为后世称颂。相传曹操亦擅隶书，刻石“衮雪”二字

即为其所题（如图2-2）。许多书法大家如蔡邕蔡琰父女、钟繇、卫瓘、邯郸淳等受到曹氏敬重，甚至成为曹魏重



图2-2曹操所书“衮雪”二字

臣。他们的书法造诣在北方影响极广大，后来包世臣提出北碑南帖论，其北碑之祖即上溯到这几位书家。从目前出土的此期墓志来看，虽无他们的亲题刻字，但都是规整的八分隶书，横画起笔逆锋，收笔重按出锋，结体方正且有雷同感，而八分隶书正是当时诸家所擅长的铭石书体。当时书丹者受上述名家的影响熏陶自是情理中事。当时应用性书体已由隶书转向楷、行书，甚至出现了崔、杜这样的草书大家。但在庄重场合，人们似乎还是习惯用古朴规整的八分隶书体。即如“鲍捐神座”、“鲍寄神座”，虽寥寥数字，亦采用八分隶书书刻，只是结体稍嫌幼稚，夸张失度，想必是低等书手所书或由刻工直接镌刻而成。

2. 东晋士人人性自觉与“二王”书风

永嘉末年西晋都城洛阳陷落，西晋公卿士大夫、中原名门望族纷纷南迁，逐渐发展成为东晋的上流阶层。这就是历史上的晋室南渡。当时的名门望族如南阳庾氏、刘氏、琅琊王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等，其中琅琊王氏就是书圣王羲之的宗脉。他们南渡后凭借优越高贵的门阀地位及其较强大的势力，不仅参与了政治、军事、经济的建设，而且作为文人士族，将中原文化

艺术也带至南方,一些文化典籍名迹法书虽于仓皇离乱之中不免散佚,但仅存者亦由此南渡至东晋。此后至隋王朝统一天下的近三百年,江左风流蔚然勃兴,诗文书画在士人的精神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为人们寄托性情之所在。这一方面是由于客观上经济政治发展日渐成熟稳定,士人生活优闲;二是主观上人性的自觉意识被唤醒,在平静、优越、闲适的生活中,由寻求情调、注重荣誉演化为一种强烈的自我肯定和自我表现欲望。因此,诗酒唱和,尺牍争胜,题壁鉴评甚或君臣赌书成为时尚佳话。由于帝王提倡,社会推崇,世家传承,研习书法、挥翰抒情成为当时士人最热门的雅事。可以说,书法艺术不仅是士人寄托性情之所在,甚至也体现着当时的社会价值和人们的文化心态。若以书法造诣之高、影响之巨而论,就中尤数王氏、谢氏、郗氏、卫氏、羊氏几大家族,人才辈出,杰出者成为书法历史上彪炳千秋的大家。当时书坛的领袖人物王羲之及其儿子王献之所创立的风流妍美的“二王”书风,将古老的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推向了历史上第一个巅峰,由此奠定了其“书圣”的地位,从而受到历代书家的敬仰和膜拜。图2-3即为“二王”行书帖札。

图2-3王羲之行书帖札

